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李国兴 陈金龙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李国兴 陈金龙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 李国兴, 陈金龙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161-2861-9

I. ①中… II. ①李…②陈…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520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王晓琳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 // www. csspw. 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5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李国兴 陈金龙

副主编：董世明 程京武 谢迪斌

作 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燕	帅国文	田杨群	刘文艺
朱么武	陈金龙	陈申宏	陈红心
陈晓静	陈伟平	李国兴	李 翔
李 霞	宋玉忠	宋 翎	宋善文
余信红	张忠江	林清明	杨乃良
周茜蓉	郑亚伟	赵军祥	贾孟喜
曹天禄	曹顺霞	谢迪斌	程京武
董世明			

目 录

绪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演变与内涵升华	(1)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6)
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	(6)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	(18)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与历史逻辑	(32)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成与特点	(42)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上）	(57)
一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	(57)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成效与突破	(65)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与法治进程	(79)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道路	(93)
五 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冲突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113)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下）	(128)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128)
二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与对策	(141)
三 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国际演变与我国实践	(152)
四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课题	(166)
五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演进与特点	(177)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视野	(192)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比较	(192)
二 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评价与启示	(207)

三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发展	(218)
四	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34)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	(249)
一	中国崛起的国际反应	(249)
二	中国与世界大国关系的新发展	(267)
三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变化	(278)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296)

绪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演变与内涵升华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30多年来,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时代的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拓展与升华的过程。

一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拓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启动的改革,最初设想是在坚持已有社会主义模式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不动、基本模式不变,但又要有中国特点。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维持社会主义已有框架、模式的前提下立论的,偏重的是“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修饰和限定。1983年7月1日,《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7月12日,中共中央就学习《邓小平文选》向全党发出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能帮助我们“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保证”^①,表明这时偏重从发展道路的维度来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十二大之后,邓小平在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同时,也频繁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如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的谈话;1985年5月,邓小平会见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的谈话;1985年9月,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主席杰里·约翰·罗林斯的谈话;1987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20页。

年4月，邓小平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体委员的讲话；1988年5月，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的谈话，都使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当然，这一提法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更为清楚地表明，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前，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限度是“具有中国特色”，并未谋求对于社会主义基本框架、基本模式的突破。

中共十三大报告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并在这一主体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系列相关提法，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等，均出现在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如此，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得以充实和拓展。当然，中共十三大报告并未就这些衍生提法展开具体论述，但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初步说明。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① 这里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机制、性质、功能进行了界定，并通过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观点，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勾勒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

二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的形成与替代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同时，高度评价邓小平为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指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这里已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主要归功于邓小平，实际上正在孕育一种新的提法。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1992年3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是形成新提法的前奏。

中共十四大报告，鉴于邓小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做出的历史性、独创性贡献，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这一概念突出了邓小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也表明了这一阶段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特征。为什么要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前加上“邓小平同志”？中共十四大报告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和说明：“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①这就回答了邓小平之所以能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独特贡献的原因。

与此同时，中共十四大报告仍保留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等提法，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彰显了邓小平的理论贡献，为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共十四大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虽未明确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但实质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上已肯定了其指导意义、指导地位。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江泽民同志在悼词中，重申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继续使用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新的定位，强调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已明确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中共十五大开始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从此不再使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当然，中共十五大在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的同时，依然保留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等衍生提法，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具体阐述，框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三位一体”的基本布局，进一步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概念。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与升华

自中共十六大开始，原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中“有”字不再保留，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更为简洁、有力的概念。这一概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独立意义，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仅是满足于“有中国特色”，而是力求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或社会主义样式。由于主体概念发生改变，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相应的衍生提法也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提法随之出现。其实，早在1985年，意大利联合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选》时，其书名的副标题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随着海外对“中国模式”关注的升温，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总结和升华。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里从“道路”、“理论体系”两个方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进而界定了“旗帜”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则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

2011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括为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其实，早在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体委员的讲话中，就已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体概念之下，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中共十七大的“道路”、“理论体系”“二位一体”升华为“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囊括“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个方面的主体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所包含的内容就是指这三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基本总结和升华。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七大报告继续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提法。

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个方面，并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充分彰显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自豪感。与此同时，中共十八大报告还从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四个方面，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如此，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内涵的拓展与升华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理论探索、认识提升的过程，更是时代发展、实践发展的过程。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本章由四个专题组成，集中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与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成与特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把握和宏观审视。

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理论创新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①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12 页。

这一论述显然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之外，但这并不等于放弃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丝毫没有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① 这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于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理论先导。

（一）毛泽东思想之中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创立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中华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创立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主张经过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反复论述了中国不能建立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也不能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他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1949年6月，中国革命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为了给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做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①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续前进,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组织形式的政体,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1956年底,通过互助合作道路,实现了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确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中国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总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先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植于毛泽东思想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壤之中,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前提。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②

(二) 毛泽东思想之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征程。他敏锐地把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观点,实践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这些探索集中起来,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 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

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②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页。

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 在中共八大上，党和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是强调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毛泽东和党的八大的正确论断，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2.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

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全面分析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② 毛泽东已初步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同时又认为这种社会基本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来解决。改革开放之后进行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直接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关于社会结构矛盾，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结构，不可避免地存在对抗与冲突。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只存在一定的阶级差别，社会结构也划分为不同利益的各种阶层，这种阶级差别和阶层差异之间的矛盾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以民主的方式，以团结—批评—团结的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矛盾。他还论证了如何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由阶级结构转变为阶层结构，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纳入新阶层结构奠定了认识基础等等。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观是新时期改革发展动力论的立论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奠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3.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

早在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后来,他又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训后,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4. 关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1952年12月,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设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②。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概念,正式把工业化发展为现代化,即“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③。在1957—1958年的多次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④,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中。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又提出了现代化国防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⑤这一表述,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四个现代化”思想,为我国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② 《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2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④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63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四个现代化”的科学表述奠定了基础。1964年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分两步走的伟大战略步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虽然，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和破坏，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没有付诸实施。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战略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毛泽东思想之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总结我国“一五”计划实施的实践，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固有模式，开始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积极探索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著作中。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积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1. 关于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但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另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以“中国工业化道路”为题详细论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就是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的問題，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